引　言

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又一个建立起全国性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它所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对中国的历史以及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与蒙古族不同的是，清朝灭亡之后，当年随同满族统治者入关的八旗后代并没有返回东北故乡，直至如今。

几百年在汉族地区与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已经使满族丧失了他们当年借以打天下的民族传统。这个传统，用清朝统治者概括的话说，就是“国语骑射”。国语，指的是本民族语言，即满语；骑射，指的是满族在长期狩猎生活中练就的骑在马上奔驰射箭的特技。如今的满族，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各方面，与汉族已经没有明显差异，以至很多人提到这个民族时，都认为它已经“汉化了”

“汉化”一词并不准确，但满族确实是在不断地向周边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学习、仿效、交流的过程中，在不断地扬弃自己那些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落后的传统习俗的过程中，得以崛起、发展和壮大的。正是由于采用了汉族的一整套高度成熟的政治制度，满族才得以在中原立足并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可见，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向相对来说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学习、看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往往以“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实在是大势所趋

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特色，早在清朝中叶就开始丧失，但某些民族特色的丧失，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民族本身的衰亡。相反，满族在不断丧失自己的某些传统和特色的过程中，走出了山林，摆脱了愚昧，在身后留下了其他少数民族难以媲美的煌煌历史业绩，在他们面前展开了更加广阔的新天地。如今，满族在人口数量上，已经位居我国少数民族中的第二位。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不逊于我国任何民族包括汉族的高度，它拥有众多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人才，这一切，是那些尚生活在原来的出生地，保留了更多本民族传统的少数民族无法望其项背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很多的痛苦和不幸，满族也丢弃了很多有价值的、珍贵的东西，但是从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大方面来说，孰轻孰重，却是一望便知的。

当然，任何民族间的交流和学习，都不会是单方面的。满族入关，有其落后、野蛮的一面，但也为正在腐朽下去的汉族封建政治文化注入了一股山野之民的勃勃生机，使此后几百年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留下了这个民族特有的鲜明印记，如今，这一切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满汉两个民族 300 多年文化交流的历史，会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同时，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无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只有走出自己狭隘、封闭的小天地，积极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一切优秀的、先进的东西，同时勇于抛弃自己不合潮流的旧俗，这个民族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强盛，并在世界上为自己争得立足之地。同时，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才能因此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从白山黑水到辽沈平原

1. 悠久的渊源

满族的族名是 17 世纪中叶才出现的，但它有着悠久的渊源。人们一般认为，它的最早先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肃慎。肃慎是以向中原王朝进贡过“楛矢石砮”而闻名的。此后，两汉、三国时期的勿吉、挹娄，隋唐时期的靺鞨，金、元、明时期的女真，都被民族史学家归入到同一个族系中，称为“肃慎一满”族系这个族系主要活动于东北的东北部，也就是长白山以北、松花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它们在文化上存在不少共同的特征，如语言相同，冬天都住在半地穴式的建筑中，“俗皆编发”，祭祀用猪，流行着与渔猎经济密切相关的动物崇拜等这与活动于东北地区的西北部，以“逐水草而居”为特点的东胡族系的游牧民族，构成了显著的区别。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肃慎一满族系中的先进部分，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崛起于东北大地。他们接纳周边其他民族的成员，汲取新的文化养分，然后形成新的民族，并陶冶出独特的文化风采。其中如隋唐时期的粟末靺鞨，曾经与一部分高句丽人一

起，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了国家，名叫振国。振国的首领大祚荣，后来被当时正处于强盛时期的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此后便以渤海为国号。渤海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各项制度，都是仿照唐朝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它的儒学、宗教、文学和艺术，处处体现着盛唐文化的风格和影响。渤海国一度非常强盛，号称“海东盛国”，延续了200余年，后来被契丹族建立的辽国灭掉。女真人建立了金朝以后，把它的许多遗民纳入到女真人特有的组织猛安、谋克之中，然后又与汉人或其他族人逐渐同化，到元朝时，已被看作是“汉姓八种”之一了。还有一部分遗民，则迁居到朝鲜境内，成为后来高丽国的居民。

继渤海国之后再度在东北大地上崛起的肃慎族系后人，是1115年建立金国的女真。他们接纳了高丽、室韦、突厥以及汉等各民族的成员，使它的文化蕴含了远比它的先人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仿依汉文的楷书制造出女真文字早在兴起之初，全国的统治者就熟悉汉族的历史典故，常用来作为自己治国用兵的借鉴，后来的满族统治者，便继承了这个传统。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尽管统治者制定了限制本族人学习汉语文、改用汉姓的禁令，但他们的主观愿望却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朝后期，在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中，原有的民族特点已经基本看不到了。到了元代，他们被列为广义的“汉人”之内，与汉人已无显著区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些民族居住和活动的地域得天独厚。一是这个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各部落不断迁徙往来的场所，这种迁移给各民族带来更多接触、交往的机会。其间固然也会有碰撞，有冲突，甚至会发生流血和战争，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更常见的情况还是和平的通婚、贸易和融合。没有哪个民族的血缘是单一的，这一点，构成了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多源多流的特征。二是这个族系的各民族，地处于东北地区南部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与西部东胡族系所代表的游牧文化之间。这代表了我国古代两大文明体系的文化，使散处于山林水滨的肃慎系部落民众得到丰富的滋养。他们的每一次迅速崛起和壮大，无不是受到这两大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尤其是与汉族农耕区直接毗邻的格局，使他们几乎无法偏离这一规律，那就是因汲取汉族文化的滋养而强大，然后抵御不了文明富饶的诱惑而进军那片地区，并最终融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消失了自己。

14世纪以后，从居住在明朝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中，又一次分化出了一批先进者——建州、海西诸部，他们同样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满族。

这些从地阻万山、林木蔽天的黑森林中走出来的狩猎民，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岁月中几经辗转，最后，建州女真定居在今天辽宁省东部的苏子河畔，海西女真则迁徙到了开原东北、辉发河流域北至松

花江中游的大曲折处。在他们面前，从此出现了一片崭新而又广阔的天地。

这些女真人迤逦南迁所经过的这片土地，其实早在明朝初期，就被置于朝廷的统治范围之内了。到永乐年间，明成祖经略黑龙江下游，在遥远的黑龙江入海口，依山面水修建了永宁寺，这使女真人早在接触蒙古的藏传佛教之前，就感受到汉族文化和汉地佛教的影响。明朝在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一带建立了大大小小 270 余个卫所，对于到京城朝见的女真首领，朝廷为他们量官授职，实行政治上的羁縻控制。明朝还在辽东开设“马市”，将汉族地区的耕牛、农具、缎匹、盐米源源输入女真人部落，换取女真人的皮毛、东珠、马匹、药材等各种土产，促进了女真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依赖

据明朝人记载，这一时期络绎往来于女真各部落间的汉人男女，几乎占了当地人口的一半。而正处于向奴隶制急剧过渡过程中的女真人，则除了与明朝进行频繁的贸易之外，还经常不断地对汉族地区进行掳掠，抢夺人口和牲畜。明朝中叶，在许多女真部落中都能见到汉族人，有的是被掳去的，也有的是为逃避差役或畏罪逃亡的他们被女真人驱使在田间耕作，同时也教女真人“板竹以为居，缯练以为衣，火食以为食”（陈继儒：《建州考》），使定居后的女真各部落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到 16 世纪初，苏子河畔已是一派“农人与牛，布散于

野”的景象了。当然从事农耕的，都是汉人和朝鲜人，女真人自己主要还是从事采集、狩猎并以作战为业。

汉文化的影响在女真人的精神生活中日渐明显。那些经常往来于汉区，尤其是经常到京城朝觐的女真上层，无不深受汉族文化的濡染，如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就“能解番、汉语言字义，尤通日者术”。这样的女真上层，当然不只王杲一人。建州部首领、后金国创建者努尔哈赤，年青时常常往来于抚顺一带的马市，在与汉人、蒙古人的交往中，掌握了蒙古语，也初步听懂了汉语，认识了一些汉字，并从汉人那里了解了许多明朝内部的情况。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喜读的就是汉族的小说《水浒》和《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当时在女真人中的影响非常广泛，不仅书中所推崇的“忠”、“义”等汉族封建道德规范成为努尔哈赤等女真人处世为人的道德准则，书中所述的政治军事战略也成为他们制订内外国策和作战方略必不可少的依据。书中人物关羽，更因其英勇善战、忠君信友的大将军形象，受到崇尚武功、恪守信义的女真人的特别喜爱。他们很快就把汉地对“关圣帝君”的崇拜接纳过去，以至于明代关外蒙古、女真部落首领与明朝边将盟誓的时候，都要请出双方所笃信的关羽圣像，摆设香案祭奠，然后再杀白马、黑牛，白酒抛天，歃血盟誓。当然，后者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典型礼俗。

佛教作为盛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渤海国时期，就已风靡于白山黑水之间。从辽、金以至元的历朝少数民族统治者，都经历过从原始萨满教皈依佛门的转变，并在辽东遗留下大量佛教梵宇和经久不衰的影响。1616 年，努尔哈赤称汗立国之初，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所建造的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七大庙”，就是接受这种影响的产物。据说，他平时常常手持念珠，言语间也必称我佛如何如何，这导致了植根于原始渔猎文化之中的萨满教的急剧衰落。

2. 汗国的建立与“天”的观念

努尔哈赤最初建国称汗的时候，取仿和借鉴的，主要不是汉制，而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汗国的立国模式。

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辽到金，“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之后，渐成汉俗”，几乎成为这片土地上各个民族发展的规律，结果是进入汉地之后的丧失自己努尔哈赤决心避免重蹈复辙，他设想以山海关以西、辽河以东“为各自国界”，建立女真人的国家。他对汉人及汉文化所持的这种严加戒备的心理，是很耐人寻味的。

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与女真之间，在政治上、文化上以至血缘上，也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元朝，女真人曾处于蒙古族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之下。元朝灭亡后，许多故元降将和遗民留居东

北，与女真部落交错而居，互通婚姻。尤其是海西女真，由于所居地域接近蒙古诸部，与蒙古人的交往更为频繁。海西四部中最强盛的叶赫部，据清代官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其先人就是蒙古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从他所取的蒙古名字来看，也很象是蒙古化的女真人。南迁后的海西、建州诸部，由于同蒙古一样受明朝的压迫，更是从感情上和地位上趋于一致。

明代女真人废弃了难以掌握的女真文字，转而习用蒙古文字。建州女真人曾对朝鲜官员说：“用本卫之人，朝鲜文字虽或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者”。直到后金天命年间，女真人仍然只知蒙书，文牍往来，也都用蒙古文。努尔哈赤甚至曾向朝鲜人夸口说：“我是蒙古遗种”，虽然不是事实，却活画出他对蒙古文化倾慕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蒙古语词汇，尤其是有关牧业生产、生活的用语，例如马的毛色、特性、马具的名称等，进入了满语之中。

后金国设置“札尔固齐”，这原是蒙古国负责民事与司法的官员它还行用台吉、巴克什、巴图鲁、达尔罕等蒙古尊号，重用通晓蒙古文化的额尔德尼、噶盖等人，后来流行于世的满文，就是他们奉努尔哈赤之命，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加圈点创制而成的。

正在迅速集结的新的民族，需要有能够凌驾于众部落之上的众望所归的主宰。努尔哈赤从蒙古等

草原民族的文化中，寻求到了适用于他的思想武器，那就是“天”的观念。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万物的缔造者，这是世俗间出现统一的专制君主在人的信仰和观念中的曲折反映，也是在文化落后、尚无文字的渔猎部落中所不存在的。

“天”的观念与后金社会的政治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金建国，以“天命”为年号，国都赫图阿拉，设有专门的祭天之所，每逢遇到重大事件，努尔哈赤一定要率领诸王与群臣向天拜祝。1593年，海西叶赫等部纠集了三路九部联军向后金大举进攻，努尔哈赤便在战前向天拜祝说：“天地三光，万灵神祇，我与叶赫本无事故，今彼引兵攻我，惟天鉴察。”他祈求天让敌人在战斗中精神委靡，而自己的军队则斗志昂扬；祈求战士不丢弃武器，马不失蹄，这与元朝成吉思汗每逢大战之前对天祈祷的内容以至所用词汇如出一辙。这种做法，一直到入关后百余年的乾隆朝，在高宗平定大小金川、征准噶尔部等战役期间到天坛祭天时所作的诗句中，还屡屡可见。这与明朝皇帝祭天求雨保佑五谷丰登的做法，大异其趣。

努尔哈赤也象成吉思汗一样，一贯以奉天命行事自诩。1618年4月，他以明朝“害我祖、父”、“卫助叶赫”等七条仇恨，号称“七大恨”为由，与当时十分强大的明朝公开决裂，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策之一。敢于迈出这一步，要具备非凡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勇气。努尔哈赤以“天命”、“天意”作为鼓舞和支持自己与部众的力量。他说，凡天下各国互相征伐，都是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他还强调，自己兴兵以后，正因为合乎天意，所以天就厌弃海西四部而助后金，现在明朝偏要扶助已被天所厌弃的叶赫，就是违抗天意，结果必然失败。这些说法，无疑为地处偏僻、相对弱小的女真人灌输了一种信念和力量。

努尔哈赤对明王朝乃至汉人怀有蕴蓄已久的怨忿，对汉族文化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敌视和排斥心理，但汉族的影响，还是渗入到了后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尔哈赤曾从明朝要去盖房的瓦匠和画匠，招徕浙江刑名人员管理钱粮；他还任用被俘获的汉人文士龚正陆（原藉浙江会稽，客居辽东）为师傅，以万金之资供养他，让他掌管金、汉文书；又任用通晓金、汉两种语言的文人额尔德尼、达海、希福等人，令他们在书房掌管文事。

1621 年 3 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西进，一举攻占明朝辽东重镇辽阳和沈阳。作为明朝东北边区少数民族的女真人，从此进入了汉族地区。这标志着后金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女真人与汉族人民愈加密切的接触，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攻下辽阳之后，努尔哈赤下令释放狱中官民，设立游击八员、都司两员，以治理政事，这都是明朝的官名。从此，后金统治机构中的一些官职，就袭用了明朝官吏的名称。

叶赫部被后金攻灭之后，努尔哈赤发布了《檄明万历皇帝文》，目的是用历史上的兴亡之例，阐述他所谓的“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的道理。在他列举的 19 个例子中，有一些是金代女真的，但更多的还是汉族历史上的著名事例，如周幽王败于犬戎、刘邦以布衣起兵而得天下等，可见他对汉族历史已熟悉到可以随手拈来作为借鉴的程度。就在他死前不几天，还曾召集诸王大臣，谆谆告诫他们，说为国君者不得耽于安逸，每当“天”将降大任于某位君主时，必先让他备尝艰辛，使他即位后能够推己及人，体察民心，这正是南朝宋的国主刘裕与群臣谈话的内容。

汉族的封建伦理观念，也开始点点滴滴地渗透进了后金的社会中。这首先是来自《三国演义》等汉族小说，进入辽沈后，也直接来自于归附了后金的汉人尤其是明朝降官。努尔哈赤曾宴集诸王大臣，要他们世世遵守孝悌之道，不可违逆。他还几次召集自己的女儿们，要她们安分守己，不准凌虐丈夫，不准败坏纲常，他对娶了汗女的众额驸（满语女婿之意）说：“凡我的女儿不贤，你们一定要告诉我，罪当诛则诛，不当诛则废，我再另替你们娶别的女人。若是她们不贤而你们不告，是你们的错，要是你们告了而我不管，是我的错。”对自己女儿尚且知道用封建纲常约束，对其他妇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在这一时期，作为战胜者的女真人，与

辽东一带汉人间的关系，还是以敌视、冲突和战争为主的。努尔哈赤为了安插本族人民，强迫汉人大举迁徙，又规定女真人要与汉人同住、同食、同耕，实际上是纵容女真人强占汉人房产、夺取汉人粮食、强迫汉人为他们耕田，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这一切激起了汉人强烈的反抗，对此，努尔哈赤予以毫不留情的血腥镇压，刀锋所向，首先就是读书人。这就导致了努尔哈赤晚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使后金的经济遭受空前的破坏，政权陷入严重的危机。后金国进入经济文化远比自己发达的汉区以后，应该沿着什么方向走下去，应该如何处理满汉间的民族关系，已成为关系这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

3. 建国方向的转变

努尔哈赤的后继者，是清太宗皇太极，是一个胸怀大志并善于审时度势的统治者。他与努尔哈赤统治的最大区别，就是看清了向汉族学习是大势所趋，从而扭转了其父以蒙古模式立国的方向。他在位不到 20 年间，后金—满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封建化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向汉族政治、文化学习和看齐的过程，带领满族人民成功地走过了这个过程的皇太极，终于为自己的国家奠定了问鼎中原、统治全国的雄厚实力。

与戎马一生的父辈相比，皇太极这一代的女真子弟，毕竟有了读书和受教育的优越条件。据说，

努尔哈赤曾为子侄们聘请了汉教习，对他们进行正规严格的汉族封建文化教育，其中最勤奋好学的，就是皇太极　当时有朝鲜人说，他是这帮子侄中唯一能读书写字的一个。皇太极熟悉汉族历史典故，也非常注意研究金朝祖先的经验和教训。当他承继汗位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时，已具备了他的前辈所不具有的政治眼光和抱负，后金国从此经历了至关重要的转变。

转变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总的纲领是从原先依照蒙古立国模式，转而听取汉人文士的建议，叫做“参汉酌金”规律是人的意志难以改变的。皇太极对中原那片土地的魅力无法抵御。他实在不甘心永远偏处辽东一隅，取明而代之的野心，使他除了入主中原这条道路之外别无选择。

后金开始模仿汉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天聪三年（1629年），也就是皇太极继承汗位的第三年，设立了文馆。文馆中的儒臣分为两班：一班以达海、刚林等人为首，负责翻译汉文书籍；另一班成员有库尔缠、吴巴什等，负责记录本朝政事

达海，官职为“巴克什”（蒙古语的教师之意）。达海9岁起读汉书，通晓满、汉文义，自努尔哈赤时起，凡是后金与朝鲜和明朝的往来文件，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皇太极时期的官书称赞他“佐太祖（即努尔哈赤）一代文明之治”，指的就是他用满文译述汉文典籍之事。

达海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到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38岁盛年时死去，但所译出的和尚未译完的书已经有《明会典》的刑部卷、《武经》（包括《黄石公素书》、《黄石公三略》和《六韬》）、《孟子》、《三国志》（其实是《三国演义》）、《大乘经》和《万宝全书》等。在他所译的书中，居首位的是兵书，这当然与后金以弧矢打天下的特征有关；其次是史书，也有经书，以说理的为主。此外也有供消遣的，如《万宝全书》就是明末人所编的一部故事笑话集。这些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三国演义》，它对初兴时期的满族吸收汉族历史知识和军事战略，起到了行动指南的作用

达海最大的功绩，是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在皇太极的授意下，创制了新满文。进入辽沈平原汉族聚居的地区以后，后金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与汉族、蒙古族之间的文字交往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日益增多，老满文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达海将太祖时额尔德尼等人创制的老满文加以圈点，以区别读音，并创制了12字头及记外字的符号，这就是新满文。为解决拼写汉语借词的问题，新满文专门增加了“特定字母”和“切音”字母，使汉文典籍的翻译工作获得更大便利。新满文的创制与运用，是满文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变化。尽管达海不久即辞世，翻译工作却仍然顺利进行，甚至那些目不识丁的八旗兵丁们，也通过丰富生动的汉族历史故事，多少接触并熟悉

了汉族文化和汉族封建社会的世界观。

文馆中，另一些巴克什的职责是修史。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已开始仿效明朝编纂实录，天聪六年（1632 年）十一月，又有汉族秀才杨方兴奏请皇太极编修国史，用金、汉两种文字书写，使金、汉人都知道先汗创业的艰难和当今皇上继承汗业的苦劳，千秋万世，只要一开卷便朗然在目，谁也不敢埋没。在皇太极的倡导下，《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崇德会典》等一批非常富于史料价值的文献终于问世了。它们记载了这个民族从初兴到强盛的历程，虽不免歌功颂德之嫌，毕竟成为如今人们了解清朝开国历史的主要依据，也是满族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馆吸引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汉族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皇太极必不可少的智囊团成员，也成为后金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范文程和宁完我。

范文程，明朝兵部尚书范𫓧的曾孙。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跟随父亲范楠居住于抚顺，在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时归附。宁完我，辽阳人，被俘于努尔哈赤攻占辽沈之时。二人先后被皇太极召入文馆供职之后，极力用汉族的儒家观念与文化改造皇太极，在仿照明制，改订中枢官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宁完我建议皇太极以历代帝王为师，以汉族典籍为鉴，励精图治，锐意兴革，以达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